

●主持人语

春回地暖,倏忽间已是早春二月。本期“名编写名家”我邀请了我的好友——出版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王为松写他的作者刘统。刘统这几年写一本红一本,他的《战上海》和《火种》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沪人社这几年的主题读物也是红红火火、高举高打。图书走红,表面上红的是作者,背后则是作者与编者携手的温情故事。令人悲痛的是,刘统不久前离世,传奇作者的故事不再续写,而王为松社长也在前年离开了出版社,到上海市社科联任党组书记,重开新领域。我理解为松此时写此文的心情。

认识龚爱萍纯属偶然。2018年秋天,四川省委宣传部邀请我到成都作讲座。我那天比较亢奋,状态奇好,离开台上座位在观众中穿梭演讲。这本质上反映了我无知却好为人师的“大患”,但一批社长不以为患,反以为“奇”,于是我领受“错爱”,变本加厉。会后大家加我微信,龚社长发给我她拍的我“疯狂”的好为人师的“丑态”,并说“50来岁的人了还有如此激情不容易”。此后我留意她的微信,发现她的生活与编辑色香味俱全,五彩缤纷、生机盎然,很合我意。可是,看到她1月26日发出“看完《复活》,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下半辈子都是假期了”的微信后,惜叹她的退休,便立即向她组稿。她答应,我若惊。

陈文瑛是我的部下,是第一批“凤凰名编辑工作室”的主人。两年前我听过她讲转行做编辑的往事,觉得很神奇。自己人,因版面限制,在此不细表,因为她答应继续为我写,以后再表。

——徐 海



我认识刘统是许仲毅介绍。我那时还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仲毅是人民社历史中心主任。有一年上海书展,我陪沈昌文、陈子善、贺圣遂、俞晓群、陆灏等人在杏花楼吃饭,仲毅请刘统、程兆奇、姚大力等人也在杏花楼,他事先叮嘱我,届时你一定要到我们这桌来认识一下大家。就这样算是认识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我知道仲毅一直在争取刘统的《大审判》等书稿。

过了几年,人民社的同事齐书深和楼岚岚拿到了刘统、金立昕、袁德金等人的“决战”丛书的版权,一套六本的丛书里刘统一人写了三本,《东北解放战争》《华东解放战争》和《中原西南解放战争》。经过认真的编辑和必需的送审等程序之后,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全套书在八月上海书展上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仪式。书展之后,我请刘统到社里来,一是当面表示感谢,二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继续合作。

我也知道他很忙,手头的国家重大项目也在节骨眼上,自己想写的题材也不少,而且盯着他的出版社编辑也不少。所以,我提出在不费他更多时间与精力的前提下,把作为丛书的《东北解放战争》和《华东解放战争》再拆分成单行本,譬如从《东北》中可以选出六七章,就叫《围长春》,《华东》也可以选出一本10来万字的《战上海》,事半功倍。我的重点自然是在《战上海》,因为再过两年,2019年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

刘统一听,就说,读者买回去一看还是老书不得骂我。新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不是不可以,但时间太紧,真没工夫写。我说,还有两年时间,你材料就用《华东解放战争》里的,换个角度,写10万字就够。他说,你让我回去想想。后来知道,他回去并不是去想,而是去找找。看能否再写成一本新书。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他和楼岚岚来找我,说材料足够新写一本关于上海解放的书稿,跟《华东解放战争》完全不同,但是

出版的一万零一种可能

——《寻绣记》出版记 □龚爱萍

《寻绣记》获得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展金奖,2018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们给出的点评是:“整体设计既有浓浓的民间味道,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审美。原汁原味的民间刺绣构成了书籍的章节页,也丰富了书籍的结构,给读者带来了惊喜。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文字版面质朴无华,适合静心阅读。封面采用手工剪裁的织物,和书名相呼应。”

偶遇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在一次新书首发式还未结束时,一位朋友就在我耳边悄悄说:“待会儿有一美女想见你”。到了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读者与作者互动的时候,我就远远看见人群里有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看上去有几分怪异。其实,说她花枝招展是我词穷。“从头到脚的行头,帽、衣、包、鞋,暗藏无处不在的破坏性,或者包罗如影随形的建设性。同一条裙子,上半截柔媚,下半截嚣张;同一件上衣,左半边素静,右半边张狂。这一来,就连青枝绿叶的顾客,亦会有不同‘站队’,有的人不喜,有的人爱极。”这是后来文学批评家任芙康对她的形容,准确、传神。

活动结束后,朋友把我带到旁边的咖啡厅,身旁坐着的就是这位女士——张书林。第一次见面,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任何与服装有关的话题她都能生动地发挥;说起老绣片,她仿佛一下子坠入其间,俯首即拾便是五彩斑斓。她还有一种特殊的叙事能力,能在物象与意念、寻常与超拔之间不着痕迹地切换与串联。例如,她说她认为得允许一部分服装做得不能像服装。像什么呢?“像什么也不能像服装呀!”她说。

张书林的本行是服装设计师,在北京有自己的服装工作室;也是一位老绣收藏家,收藏有数以万计的明清及民国时期的老绣片,是她耗时20多年倾尽家财四处寻来的。她把价值不菲的老绣片通过各种裁切、拼接,做成一件件让人匪夷所思的衣服。

后来在接触她的设计与收藏时,发现她总希望在服装中加入点别的什么东西,让裙子有诗歌的意象,让外套看起来是哲学家,哪怕是一条简单的围脖也想做得充满“故事感”。什么是服装的故事感?她说,远古的巫师开坛祭祀前不会好好说话,必须先洒上符水,起舞跳上一阵子,然后再念念有词地说正事。懂了?好像。她拿出了自己制作的一个小册子,写的都是她的生活随笔,文字很有意思,灵动仙气,很活泼,但我总感觉远不如听她聊的精彩,没有写出她身上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接触只停留在喝咖啡、聊聊天、拍拍照。

“写下来我们就可以出版了”

和张书林聊天就是一种享受。听她聊她的老绣,聊她的设计作品,聊她那些有各种故事的忠实客户,聊她在寻绣路上见到的人和事……有一次她聊到了凤香——一个帮她在湘西山区搜寻老绣片的本地女人。凤香是她曾在一个湘西小镇里遇到的一个小贩,她们



在小镇上相遇,两个不同境况的人因绣片而结缘,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轨迹交会。一个是出售绣片换取生活,一个是寻找绣片发现了不一样的世界。当作者得知凤香的死讯,赶到凤香的家中,重返当年寻找绣片的故事现场,和死者的丈夫有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让本是悲剧意味的情节充满了戏谑和更深的韵味……

“写下来,就以‘凤香’为题写下来!写下来我们就可以出版了。”我兴奋得居然当场许诺,这很不像我的风格。

这个作者有丰富的且普通人没有的生活经历,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还特能写。我直觉她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但是我忽略了她另外的身份——她是收藏家、服装设计师、服装品牌工作室主理人,是个十足的大忙人。我等她这篇稿件整整等了三个月,三天两头地催。她真正动笔写这篇文章,也就三五天的时间。后来,《凤香》真的成了《寻绣记》里的主打篇章,让很多读者欲罢不能。

文字稿件催齐了,通读一遍,觉得超出了我的预期。她的文字异于一般的作家,可以说一出手就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内容以作者亲历的角度,寻找散落在民间的古老绣片。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接触有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样貌,这本身就是乘着故事去寻找故事。都市与乡野邂逅,时尚与传统重逢,咫尺与辽远相遇……这里有反差极大的眩目,有落差极高的惊悚。

是的,这本书应该从视觉上一眼就传达出这种感觉;这是为设计者做的设计,设计本身必须是惊艳的、非同寻常的。做一本美美的书,光有文字是远远不够的,书籍审美的时代来了。

从设计师到生产线

慢慢地,我把思路聚焦到了那些绣片上。绣片与纸张有相同的特质:它们都由纤维组成,具有某种可塑的女性特质;它们都是某种文化符号的载体。如何把这一想法付诸行动?我想到了合作多年的书籍设计师许天琪。我邀许天琪去了作者在成都的工作室,作者给我们介绍了她的绣片和她用绣片制作

的服装,听说她在北京还有一个工作室,藏品也大部分在北京,设计师蠢蠢欲动,于是我们一起奔赴北京工作室,参观她的老绣藏品。许天琪站在一大堆明清老虎帽中兴奋地说:我知道这本书怎么做了。

“在做这本书时,就是想呈现出这本书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其他的作品。”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理念,设计用一根线串联了一本书的故事,给予寻绣的“寻”视觉上的线索。设计师从上千种纸张里选出四种纸张来(亚特兰斯丝、云龙纸、宣清、顶级画刊),这些纸张必须是很轻、很柔软的,封面用的是风絮装帧布,这样,整本书就像一摞绣片一样妥妥软软地塌在手里。看了北京工作室一地满满的绣片的主色调之后,设计师在整本书里用了一种专色,这种专色的专业名称叫 Pantone 032red C,她还让印刷厂工人在其中加入微量荧光墨,以呈现如丝绸般温润的光泽,这种红我称它为暖红,就是那种暖暖、软软的红。

成书拿在手里,感觉不是在看一本书,而是在欣赏一张张久远的绣片,只是在绣片里作者还附赠了有关老绣的故事。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编辑我、作者书林、设计天琪,我满以为靠我们三个女人可以唱一台很好的戏,到最后与印刷厂对接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印刷工艺和装订技术的支撑,这本书是不可能完美呈现的。

封面是一半布一半纸的设计,布边怎样手工拉毛才更自然,扉页部分用一个M折嵌套一个筒子页,极大地增加了装订难度,专色调整过程中潘通色与荧光墨的比例要反复试验寻找最优方案,等等,所有问题不仅仅要与印厂技术人员沟通、调整,还得一次次地打样,每次改变一点,直到完美呈现。在这本书一启动设计流程时,我们的设计师就在考虑她的每一个想法应该用哪种纸张哪种工艺才能实现,我就和作者、设计师以及印厂技术人员四人建了一个工作微信群,群名就是:《寻绣记》生产车间。后来,我每做一本书,都会成立一个生产车间,过过“车间主任”的瘾。

从2017年8月见作者张书林第一面,到2018年6月拿到新书《寻绣记》,整整十个月,我觉得这是能做出了一本让自己比较满意的书的起码的周期(与十月怀胎纯属巧合)。那时,正是电子媒介狂飙突进的时代,一位老出版人曾说:也许只有精致出版才救得了图书出版。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书是不是受了这位老出版人的影响,我只知道,我救不了出版,但我可以努力精致。

设计师许天琪自这本书之后,几乎是每年有一个图书作品获得大奖,她现在已经是书籍装帧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作者张书林随后两年又出版了两本书,仅2022年就有两家出版社与之签了约稿协议。两天前,张书林微信告诉我:姐,下午我从老家湖北孝感回北京前见了几个通过我书店的朋友找到我的本地读者,他们热情地把我送到了机场。(作者系成都时代出版社原副社长)

从《战上海》到《火种》

□王为松

需要时间。

我说,你现在就开始写,我们编辑团队全力配合,包括查核资料,但是2018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日必须交稿。

刘统平时话不多,不像演讲时滔滔不绝,但透着斩钉截铁:这不可能,时间太紧,你们查资料也没用,这活要干还得我自己干,别人帮不了忙。

我说,这书要出就必须2019年5月出,最好是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就出了。重大题材需要送审的话,至少要有三五个月的提前量,所以最晚也是2018年6月底要交稿。

刘统说,我上你们圈套了。

我只能说,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尽己所能。

这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将来书做出来是个什么样子。但有一条是我们必须也可以做到的,就是像刘统一样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

跟他说完后,我们就立马开始申报选题,同时申报2018年度的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我跟编辑说,真要想把刘统的新书出好,就必须先把他已经出版的都读一遍,像《北上》《跨海之战》《中国的1948年》等等,但凡能买到的都要买来读,再从编辑的角度,写一份选题策划报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赶在2019年初出这样一本书,我们为什么认为刘统是这样一本书最合适的作者,我们希望作者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将如何来宣传推广这本书。为了把问题讲清楚,选题报告必须写满一万字。

刘统得知后说,你这不是把人给逼疯了。

我说,不疯魔,不成活。不过你放心,人民社的编辑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是团队协作,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

2019年1月,《战上海》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同时我们联合《中华读书报》在北京召开专家座谈会。有专家看了书后说,这本书为2019年的主题出版开了个好头。《中华读书报》以此为标题发了头版。

出版后取得的宣传效果,与我们当初在做选题策划时的构想是吻合的。我们和刘统达成的共识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讲述上海解放的历史细节,更是要为70年前用积极作为和无畏担当赢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人画像,为70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立传,为70年后我们再以战上海精神激发起成为新时代改革开

曾经看过余华的一个视频,讲他们四个作家参加文学论坛,以“我为什么写作”为题发言。余华说是因为“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稿费还归自己”。莫言说“想给自己弄一双皮鞋”。王朔也说了类似的故事。苏童原本准备的发言稿“很正经”,从自己上大学的经历讲到如何因为热爱而走上了文学道路,但报告了前面三个人的发言,死活也不愿意说自己准备的稿子了,因为他觉得自己那样说“很丢脸”,也应该像余华他们那样“瞎编一个”——其实余华说自己从牙医转行当作家的经历全是真的,只是别人听着像段子。

我当编辑已经整整30年了——干这行年头多了,免不了会被问到“为什么当编辑”“怎么当上编辑的”之类的问题。我也挺认真地想过,老实说,也确实谈不上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我当上编辑的那些事,也特别像段子。

跟余华一样,我也是转行来的,但我转了两次。

研究生毕业前一年,我特别紧张忙碌,不仅要写毕业论文,还要给本科生上公选课,而且也要考虑毕业后的去向。父亲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早早就给我规划好了未来:读师范、当老师、回到他身边安安稳稳过日子。那时我内心十分抗拒他对我命运的安排,但又不想伤他的心,只能敷衍。我先是填报高考志愿时故意没填他要求的历史系而是填了中文系,大学毕业也没有如他所愿乖乖回家乡的中学教书,而是选择了读研。我心想摆脱家里的束缚,至于摆脱后具体要做什么,也没有明确的想法。

谁知到了秋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个学期,我们要外出访学。我原本的计划和几位同学一起走,先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到重庆,然后乘船顺流而下,经武汉、南京到上海,从上海返回西安。但是计划没赶上变化,我出发时耽搁了一天,没跟上大部队,只好独自踏上访学之路。在南京上岸那天已近黄昏,我从码头出来,乘公交车到山西路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吃晚饭的时候,在书报摊上买了一份当天的《扬子晚报》。报纸上有篇关于江苏古籍出版社高纪言社长的报道,占了大约半个版面。读了这篇报道,我发现在学校里每期必读的《古典文学知识》杂志竟然是这位高社长出版的。说来真是凑巧,这次访学,我还专门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古典文学知识》带在路上读。我当时决定第二天要去拜访一下高社长,不为别的,纯粹是想当面表达一下一个读者对出版者的崇敬之情。

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报纸来到位于玄武门的江苏古籍出版社。高社长特别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那天聊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他随口问我:“愿不愿意毕业以后到出版社来工作?”我懵懵懂懂地问:“我可以吗?”他怎么回答的我也不记得了。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师范生一般会被分配到学校里当老师,很少有干其他行业的。那时我对出版社工作也没什么概念。

拜访了高社长后,我完成了后面的行程回到学校。寒假过后,就是论文答辩和毕业前的各种事情。导师建议我毕业后先找个高校当老师,同时再读个博士学位,然后回母校跟着他做研究。到了1993年的春天,我已经落实好毕业去向。谁知三月份的一天下午,学校突然通知我去领取接收函。我疑疑惑惑来到系里,把接收函仔仔细细看了几遍,竟然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发来的!

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蓬勃之力明德。后来在申报“五个一工程”奖时,我们群策群力提炼总结了三句话:通过《战上海》这本书,充分展现从“战上海”到“建上海”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充分反映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努力塑造从“武安邦”到“文治国”的共产党人人群像,从而更加凝聚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砥砺奋进的民族品格。

此后,编辑团队在76天里策划组织了51场“边走边讲上海解放70周年实景对话”活动。沿着解放军战上海的足迹,从交大工程馆到华政友谊楼,从苏州河邮政大楼到宝山月浦解放纪念馆,从高校到企业,从机关到社区,从电视到广播,从纸媒到网络,从课堂到街头,从画展到杂技,各种形式,各种形态,各种渠道,全媒体全方位全覆盖。

从1月初到5月底,有关刘统和《战上海》的各种宣传就没停过,有朋友在我微信下留言说,陈毅战上海就一个月,你们已经战了大半年了。刘统说,你们这是把我逼疯了。

这一年里,当年的电影《战上海》被有心人翻找出来,一句激动人心的“向大海前进”唤起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记忆。《战上海》同名杂技剧一经亮相就备受社会各方关注。上海电视台也提出希望联合出品电视连续剧,这就是今年在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等持续热播的根据刘统《战上海》改编的《破晓东方》。

2019年上海书展过后,我说,我们能不能再合作一把。刘统知道我的意思,将了我一军:我有部稿子,就看你能不能出。他回去就把书稿发给我。

我们约了在上海书城对面的东莱饭馆吃山东饺子。我提出,删去一半章节,聚焦主题,你再另写一半。

刘统说,那这本还是完整保留作为遗著吧。我另外写一本。我说,老规矩,给你九个月时间写作,2020年6月底交稿,年底出书,打响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的“第一枪”。

刘统只说,我试试。

他去写,我们帮着一起想书名,既要涵盖全书的内容,又要能叫得响,既要有学术气,又要朗朗上口,既要反映百年建党的时代巨变,又要体现早期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苦难辉煌,既要有全局观,又要突出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独特性。

一天,刘统兴冲冲来了,说,书名有了,就叫《火种》。(作者系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

『转行』做编辑

□陈文瑛



此后,我当上了江苏古籍出版社文学室的编辑。一进社我就跟着白发苍苍的编辑前辈编《冯梦龙全集》《全元文》《近代词钞》……同时还编上了我喜欢的《古典文学知识》。我适应很快,对于那种人家感到厌烦的千篇一律的工作状态,我竟然特别满足,就像一个老农满足于自己家门口有块好地可以种各种蔬菜那样,甚至在心底做好了就这样干到退休的准备。我每天乐此不疲地在我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甚至接手了为《古典文学知识》画版的工作,并且画得不亦乐乎。然而,天总是不遂人愿,就在我全心全意沉浸在古籍社当编辑的第十个年头,我又不得不“转行”了。

2003年上半年,江苏古籍出版社被整编了。当时的情况是,绝大部分人员要被分流,“江苏古籍出版社”这个名字将成为历史。即将被分流的人,像菜场打烊前卖剩了的蔬菜一样,被搭配起来打成大大小小的包,由接收单位抓阄决定去向。有四五个编辑加两三个行政人员的“大包”,也有三四个编辑加两个行政人员的“中包”,还有两个编辑加一个行政人员的小包”。我就这样被打进了一个“小包”里,最终被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抓”走了。

对这次转行,我心里非常失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处于沮丧状态的,感觉命运把我弃之道旁了,前十年的努力全部归了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为适应新岗位,我像刚被移栽的绿樟,努力适应环境,寻找适宜的生长空间。然而对于少儿出版,我几乎无从下手。就在这时,我8岁的儿子“拯救”了我。

儿子特别爱读书,还喜欢跟人讨论。我给他买了很多少儿图书,也会经常带他去书店和图书馆。那时的他,每天放学后最开心的事,就是在我们过道的书堆里翻书,偶尔还会扒出几张发黄、甚至已经绝版的少儿图书。平时我们俩一起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津津有味读这些书,可对坪头论足,有时还会为了书中的某个细节争得不可开交。慢慢地,我好像找到了对少儿图书的感觉。就这样过了大半年,忽然有一天,儿子写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表扬了,他写的是《我的妈妈》,我拿过他的作文本一看,有一句话下面画着红色波浪线:“我的妈妈是个工作狂。晚上我睡觉了,她在灯下看稿子,早上我睡醒了,她还在灯下看稿子……”老师问我他写的是不是真的,我想告诉她是真的,但我没说。

曾经的失落和沮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淡去,一片新的蓝海在我眼前徐徐展现,我再一次成功“转行”。

我的两次“转行”,看似偶然,其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必然的联系。命运的安排也许无法预料,但我相信,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只要努力,该来的风景都会在路上。

(作者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